

金耀基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Sociology and China Studies

OXFORD

社會學在中國研究

金耀基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399295-5

1 3 5 7 9 10 8 6 4 2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金耀基

扉頁題字：作者自題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導 言

一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這個論文集是首次問世。此書共收論文十篇，發表時間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在時序上恰是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此書與我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及《大學之理念》同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主要的中文著述。

二

下面我對本書十篇論文作一導言，希望有助於讀此書者理解我各篇文字的學術旨趣與用心用力所在。

〈範典與社會學的發展〉、〈社會學的中國化〉及〈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學之定位〉三文，是對社會學定性定位的論述。〈範典與社會學的發展〉從根源上探析社會學的本質。社會學是啟蒙產物，法國從聖西門、孔德以迄涂爾幹(E. Durkheim)皆意在建立社會學為一門科學，此即實證主義的社會學。對實證論者言，研究對象為自然界或社會界沒有分別，而其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亦無二致。「實證論社會學」在大學治社會學者從之者多，實具有社會學範典之地位。但自社會學成為大學學科以來，「實證論社會學」之外，即有「理解社會學」之存在，這是德國韋伯(Max Weber)

所開啟的社會學範典。此一範典之社會學認為「自然宇宙」與「社會宇宙」是不同的。社會宇宙的主體是人，人之社會行動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人之社會行動則是有意義的、有意識的，此則非自然科學之方法可以有功。韋伯提出的 *Verstehen*，正是理解與解釋人之社會行動的方法論的基本。「理解社會學」範典，不是說社會學不是科學，而是說社會學是一種「社會」科學。社會學中多元範典並立競爭的發展現象，顯然不是科學哲學者庫恩(Thomas Kuhn)的範典(paradigm)概念所能適用。我三文對於社會學的本質，特別是「實證論社會學」與「理解社會學」這二個範典之特性與目標有詳透的剖析，在中文的著作中，似尚未之見，希望對於有意於社會學為志業者，有所助益，幸甚。

〈社會學的中國化〉一文之作是有現實背景的。自二次大戰後，社會學在美國取得最大發展，隨着美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美國的學術文化也影響到全世界，無可否認，在世界各地(包括發展的與開發中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社會學為範式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出現了一個「社會學本土化」的學術性運動，其旨在擺脫美國社會學的壟斷式優勢，而求學術上的獨立性。「社會學的中國化」是「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的一個組成。我是把「社會學的中國化」看作一個社會學知識論的議題，這涉及到社會學知識是否有普遍性的問題，當然，這就不能不探究社會學的知識特性等，也因此，此文與上文〈範典與社會學的發展〉有許多交叉重疊的地方。(這是要請讀者諒解的)。我指出「社會學的中國化」的二個不同層次的意義。如果「社會學的中國化」是指建立一個「中國社會學」，猶如建立一個「中國物理學」，則非我

所能認同。但「社會學的中國化」若是指社會學要與中國社會、文化結合，使社會學在中國生根，以及「社會學的中國化」等，則「社會學的中國化」不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這個意義下，我的社會學論述，特別是我在拙著《中國社會與文化》一書中論人情，面(臉)，關係等論文，可說都是「社會學的中國化」的實踐。

〈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學之定位〉一文，是我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為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系列講座的講稿。上世紀八十年代，歐美人文與社會科學界有一個「現代性」的論辯，這個論辯再次把十八世紀思想家建構「現代性」藍圖的「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提上了學術論壇。這個啟蒙方案與社會學之建立關係至切。社會學之旨趣是對世界上第一個現代社會之出現的一種回應。創立社會學的幾位社會學大家的社會學論述就是對現代性現象的探索。現代社會有何不同？它是如何構建形成的？什麼是現代性的重要元素等等，都是社會學家關切的議題。簡言之，社會學是研究西方「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大轉型的歷史過程。社會學作為大學的學科，到了二十世紀，已經「世界化」了。社會學是隨西潮而進入中國的大學殿堂的，而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中國社會也正處於一個「現代轉向」的社會大轉型的歷史過程中。這個大轉型涉及到工業化、都市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變化，根本上，它也是中國「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大轉型的歷史過程。以是之故，中國社會學無可避免地是以中國的現代化及中國的現代性建構為研究對象的。我相信這應該是中國社會學的定位。

〈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與〈中國形象——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二文，是通過評介二位美國社會科學學者所作當代中共研究的二本專著，夾敘夾議，提出我對「中國研究」的看法。自東西文化接觸以來，研究中國的學問或稱東方學，或稱漢學。漢學主要研究傳統中國，並以研究中國文化為取向，着重彰顯中國的特殊性。漢學家基本上是人文學者，特別是歷史學者。二次大戰後，逐漸形成當代中國，特別是中共研究的學術趨勢，這種研究是把中國當作一區域研究的，研究者以社會科學者為主。以社會科學為主導的中國研究的究竟意義不必完全落在認識中國這一層面，而毋寧更在豐富社會科學本身的知識層面上。

正因為如此，在一九六四年「中國之研究及其學科討論會」中，史基納(G.W. Skinner)的〈中國之研究能對社會科學有些什麼貢獻？〉及弗里曼(M. Freedman)的〈社會科學能對中國研究有些什麼貢獻？〉二文顯然提出了二個中國研究者所共同關心的詰問。我的二篇文字正是從這二個詰問來檢視索羅門(R. Soloman)所著《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及白魯恂(L. Pye)所著《中國引介》的。

〈從社會系統論分析辛亥革命〉一文，是我試圖用社會學家帕森斯(T. Parsons)的社會系統論來分析、詮釋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及其所以具有「革命」意義之理由。社會學對辛亥革命之闡析是必須與歷史結合的，實則任何社會學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必然是「歷史社會學」的研究。

〈中共社會主義之困境〉一文，寫於一九七九年十月，是中共建國三十周年，一九七九年，中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不久，剛踏上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之

路，這當然是中共改弦易轍的一個歷史性的轉機。但中共對文革之反思雖有否決搞階級鬥爭、搞急風暴雨式的群眾路線的「毛澤東主義」的智慧與勇氣，卻在倡舉「四個現代化」的同時，又強調「四個堅持」，亦即仍然不脫列(寧)斯(大林)主義的桎梏。我此文指出中國前三十年造成國家發展困境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前三十年是列斯主義與毛澤東主義分別統禦制宰中國的二個意識形態(三十年中毛澤東主義佔了二十七年)，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批判了毛澤東主義的極左性，卻堅持保留了列斯主義的專政論，此所以中共社會主義仍未完全脫離困境。

二十一新世紀的今日，中共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又已過了另一個三十年了，無可否認，四個現代化，特別是經濟現代化，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真可說已換了新天，但今日中共還是面臨了一個不可不跨越的政治改革的大關。中國今日政治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列斯主義所致，這篇一九七九年寫的文字依然有現實的意義。

〈中共「反科層的組織型模」〉一文，寫於一九七四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我此文不是對文革的全面評論，而只是論析文革中所顯示的一個特殊面相：即其反官僚主義，或本文所指的「反科層組織」的思想運動。文革，在今天固多已知其為中國之浩劫，但在四十年前卻是以中共「第二次革命」的姿態出現的。在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特別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眼中，文革是已經「異化」的蘇俄社會主義之外，另一條通往共產主義之新路。他們認為蘇俄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下，已成為「官僚的社會主義」(bureaucratic Socialism)，毛領導的文革的反官僚主義則提供了新希望。須

知，文革在實際發生的層次上，固然是一奪權、鬥爭的政治瘋劇，但它所標舉的價值符號，在象徵層次上卻有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反「官僚主義」事實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老題目，並非自文革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的反官僚主義的政治口號下，毛思想跟隨者對劉少奇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的「組織」與「管理」的規制提出鋪天蓋地的抨擊，這種抨擊其中誠有政治權鬥的糾結，而充滿教條意味，但從其粗糙、樸素的文字中亦可看到它對現代社會（不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社會）的主要組織型態——「科層組織」——的批判，這就成了有普遍性的學術關注。事實上，西方特別是美國，長期來對「科層組織」就有各式各樣學理的批判。以此，本文是把中共的「反科層組織」運動放在中國歷史與西方組織學的比較角度來研探的。我初意要寫一專書，結果變成這篇特長的論文，讀此文者如有足夠的耐心與興趣，當會體會我作此文的用心。順便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我在劍橋大學做訪問學人時，曾將此長文濃縮，寫成“A Voluntaristic Model of Organization”一文，在劍大社會學社宣讀，引起熱烈的回響，會後即投英國社會學會歷史最悠久的*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並獲接受。一九七七年此文正式發表後，更為英國一本社會學大學教科書引用，當然，在劍橋十個月，最令我感到「不虛此行」的是我在研修之餘，寫了一本《劍橋語絲》的散文集。這是我早年教研究生涯中的一段愉快的回憶。

〈現代化與中國歷史之路〉一文寫於一九九二年。中國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是我學術生涯中的中心關注，從一九六六年的《從傳統到現代》到二〇〇四年的《中國的現

代轉向》都是對此一主題一以貫之的論述。此文之作，實是針對當時在中國範圍內(大陸與台灣)，在世界範圍內，一股反現代化的知識氣候而發；並申論現代化是中國當有的歷史之路。其實，現代化是一世界性的現象，中國現代化只是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組成，因此對於贊成或反對現代化的爭議必須從世界的視域來省察思考。而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是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性」(也即是中國的現代的文明秩序)，以此對於八十年代，西方知識界(特別是其中的社會學者如哈貝馬斯(J. Habermas)等)對於「現代性」(或啟蒙方案)的論辯就特別值得我們重視。西方知識圈所論辯的「現代性」實則只是「西方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雖必有中國文化之性格，但也必然有與「西方現代性」相疊合的地方。我之所以用許多篇幅闡析「西方現代性」之論辯，正因相信這論辯對於建構「中國現代性」有啟示與攻錯的意義。

〈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範式？楊慶堃眼中的中國社會宗教〉一文，是我與上海復旦大學的范麗珠教授合寫的。這篇文章原是范教授與我為楊慶堃教授的紀念集(英文)而寫，後范教授又用中文將原文擴大充實而成此文。楊慶堃教授是費孝通先生同窗，長年在美國執教，研究中國家庭與農村卓有成就，其《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更是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典範之作，此書不止破解了長期來中國知識精英「中國無宗教」的疑惑，更正面深刻地闡明了中國宗教之特性，書中提出有別於制度性(institutional)宗教之外的「分散性」(diffused)宗教之概念與理論，在宗教社會學中有原創性的貢獻。楊慶堃教授將宗教在中國文明中倫理秩序之建立的功能關係，講得淵淵入微。楊氏對韋伯的《中國宗教：儒學與道

教》推崇有加，而楊氏此書在中國社會研究中之地位實可與韋伯名著媲美，隔代輝映，范麗珠教授對中國宗教社會學之研究，孳孳不倦，迭有新著問世，范教授未嘗親見楊慶堃教授，但得益於楊氏著作甚多，她並主持翻譯了楊氏之書，功莫大焉。

楊慶堃先生是我學界先輩，自結識以來，對我獎掖有加。一九七〇年我之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多因先生之鼓促與推介，自此開始了我在香港長達四十年的社會學研究生涯。今以此文為本書之殿，亦所以表達我對慶堃先生之懷念於萬一。

三

我於二〇〇四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難得有自在自得的暮年歲月。月前，承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之邀約，我專心為先前在牛津出版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及《中國的現代轉向》三書作增訂事宜，同時，我又整理分散多處的有關論文，輯成《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一書，計劃與上述三書之「增訂版」一併問世。誠然，這是我甚感欣幸之事。於此，我對道群兄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同事為我四書的編校工作，費心費力，感激不盡。

2012年12月8日於香港

目 錄

vii	導 言
1	範典與社會學的發展 社會學之起源與現況 實證論社會學的範典 理解社會學的範典 範典與社會學之發展
27	社會學的中國化 ——一個社會學知識論的問題 自覺或幻覺 社會學知識之普遍性問題：裏邊人主義 實證科學範典與社會學 多元的社會學範典
49	現代性論辯與中國社會學之定位 社會學與現代性 從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到現代性的論辯 全球化、文化轉向與多元現代性 文化認同與中國社會學的定位
69	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 ——兼評《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 由「天下學」到「世界學」 社會科學在當代中國研究之角色 中國的政治文化與權威問題 對索羅門中共研究之一些考察

95	中國的形象：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 ——評白魯恂《中國引介》並兼論其他 中國研究、漢學與社會科學 中國之真實與形象 中國政治體系之性格及其發展 中共現代化之諸面相 中國傳統與共產主義 在魔鬼與烏托邦之外
121	從社會系統論分析辛亥革命 革命與社會系統 辛亥革命之剖解 辛亥革命之「革命」的性格
141	中共社會主義之困境 ——論中共三十年來的意理與組織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困境 中共之組織上的困境
171	中共「反科層的組織型模」 ——歷史的與比較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中反官僚主義之文化的及象徵的意義 合理化、科層制度化與現代社會 科層組織在中西方受到批判 中共反科層組織型模之意義及制限
231	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之路
259	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範式（與范麗珠合著） ——楊慶堃眼中的中國社會宗教 傳統中國社會裏宗教的地位 理解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功能性作用 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的概念：貢獻與問題

範典與社會學的發展

社會學之起源與現況

「社會學」(Sociology) 這個作為一門新學科的名稱，是法國人孔德 (A. Comte) 在他一八三八年的《實證哲學講義》(*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中才出現的。Sociology 一字是一半拉丁文，一半希臘文的結合，它的意思是「社會的科學」(science of society)，因為在當時科學的學科中，並沒有這樣的一門科學，所以孔德才新創了這個名詞。¹ 像歷史學、物理學一樣，都是先有歷史現象與物理現象，才有歷史學與物理學的，「社會」這個現象是有人類就有了的，但社會學卻是十九世紀的產物。當然，我們不能把一八三八年作為「社會學」誕生的一年。事實上，我們是無法斬釘截鐵地裁定「社會學」之生年的，社會學之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德的先驅聖西門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² 誠然，研究

1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spects of Sociology*, trans. by J. Viertel, London: Heinemann, 1973, p. 1.

2 有些學者把聖西門看做是社會學之父，視他為影響孔德與馬克思所開啟的學院派社會學與馬克思派社會學的開山人物。見 A. W. Gouldner, *For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p. 369–910。此外，有的學者更認為十八世紀意大利的維柯 (G. Vico) 應該是社會學之先驅，維柯的《新科學》(*The New Science*) 被認為是社會學中最有原創力的著作之一，此書是論國家興衰的社會學理論。但維柯要到死後一百年才被「發現」，克魯齊 (B. Croce) 說他天才橫溢，成為一早生的「時代錯誤」者。畢斯德特 (R. Bierstadt) 認為如果維柯創用「社會學」一詞，則社會學之誕生至少可推前一百年。R.

「社會」的學問，在東西方歷史中，可以推源到中國的先秦和西方的希臘，不過，現代的「社會學」卻是西方十九世紀才問世的。那是承接着十七世紀以降「理性時代」的發展，是現代「科學革命」之後才出現的。

誠然，社會學之興起，可以看作是歐洲舊秩序在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下崩潰後，企圖建立新秩序的一種知識性反應。³ 不過，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控制「社會」的知識動機，卻無疑是受了自然科學的偉大成就而激發的。孔德建立社會學之目的，就是想把社會現象，與天體現象、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理現象一樣，以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他相信人類知識的發展，歷經三個時期，即由「神學時期」而「玄學時期」，最後則是「實證時期」。社會學就是要把研究社會的學問成為在「科學位序」(hierarchy of sciences) 中居最高位的一門實證科學的學問，故孔德開始時稱之為「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他認為社會現象可以像物理現象一樣，尋求其內在的秩序與律則。就此一實證科學的精神趣味而言，馬克思與孔德並無二致。⁴ 繼孔德之後，為現代社會學奠基的首推

Bierstadt, "Sociological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 Bottomore & R. Nisbet eds.,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1978), pp. 3-38.

3 R.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4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關係一直是聚訟紛紜的。馬克思不認為他的理論僅是一種社會科學，因為它也是革命的學說。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中有社會學的內涵，此所以今日有「馬克思社會學」。見 T. Bottomore, *Marxist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75。有一點可以肯定，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一樣，都是受自然科學之啟示而發展的，馬克思曾在《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中說：「自然科學有一天會包含了人的科學，正如人的科學會包含自然科學一樣，將來只有一種科學。」又說：「自然科學……會成為人之科學的基礎。」這種態度與孔德並無異趣，有的論者以為把實證科學觀的馬克思主義歸之於恩格斯的庸俗化是不對的，實則，馬克思本人的理論體系中一直就有「決定論」與「自發論」(voluntarism) 二種因素之存在，這就是馬克思主

法國的涂爾幹 (E. Durkheim, 1858–1917)。在涂爾幹的手裏，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才獲得確切的釐定，使社會學成為大學認可的學術領域。他的《社會分工論》(1892)、《自殺論》(1897) 二巨著，可說是現代社會學的經典，而他的《社會學方法論》(1895) 則不啻是社會學的宣言。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葉，社會學人才輩出，除涂爾幹外，如英之斯賓塞 (H. Spencer, 1820–1903)、德之齊美爾 (G. Simmel, 1858–1918)、滕尼斯 (F. Tönnies, 1855–1936)、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等，無不貢獻卓越，而韋伯則更與涂爾幹競光爭輝，成為現代學院派社會學的源頭活水。這些社會學大師固然各領風騷，自有立論。惟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二〇這三十年間，這些大師都有一共同點，即都在努力把人之社會行為 (或行動) 之研究置於一科學的立足點上；並不約而同地，都決意使社會學成為一經驗性的科學。他們不是要與哲學告別，就是要把哲學驅逐出去，這個「三十年」，論者稱之為人類行為研究上哲學與科學的「分水嶺」。⁵ 現代的社會學的面貌與精神，就是在這個時期形塑的。帕森斯 (T. Parsons) 的《社會行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的巨製則不啻為這一時期社會學的業績作了一個總結。⁶ 從三十年代到

義今日發展為「科學馬克思主義」(scientific Marxism) 與「批判馬克思主義」(critical Marxism) 之基礎。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及社會學的複雜關係，可見 A. W.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2–107.

5 Anthony Giddens,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p. 24.

6 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在帕森斯此書中，馬克思在整個社會學發展中，只佔有一邊際性的地位，帕森斯這個立場一直是社會學界中一個有趣味和引起爭論的課題。

五十年代，社會學成為一世界性的知識系統，⁷ 在美國則更獲得巨大發展，特別是帕森斯與莫頓 (R. Merton) 繼涂爾幹之遺業而發展的「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不止成為美國社會學中當陽稱尊的學派，且使社會學成為當代的一門顯學。戴維斯 (K. Davis) 在一九五九年甚至宣稱功能方法根本就是社會學分析的方法。⁸ 誠然，到了五十年代，社會學出現了一「正統的共識」(orthodox consensus)，⁹ 實證主義的功能論已為社會學者所普遍接受。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了解，為何結構功能論被視為已取得了「範典」(paradigm，其意義稍後討論) 的地位。¹⁰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社會學的「正統的共識」就劇烈地動搖了。「結構功能學派」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不止是結構功能論，而是整個實證論社

7 Kingsley Davis, "The Myth of Functional Analysis as a Special Method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December 1959, pp. 757-72.

8 社會學在中國也在這段時期獲得快速發展。在 1947 年，中國至少有 19 所大學設有社會學系，但 1949 年後社會學即遭到冷漠的待遇，1952 年後社會學已經在中國大陸的大學中消失。見 Ambrose Y. C. King (金耀基) & Wang Tse-sang, "The Development & Death of Chinese Academic Sociolog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1, 1978, pp. 37-58。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復興是四人幫垮台之後的事。

9 參見 D. Atkinson, *Orthodox Consensus and Radical Alternative: A Study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Heinemann, 1972. 以及 A.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pp. 234-8.

10 帕森斯的結構功能論在 1950 年代的美國雖未達到庫恩的範典壟斷的局面，但已被視為取得「正統」的地位。R. W. Friedrichs,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pp. 18-9. 納爾遜則甚至認為默頓 1937 年的〈社會結構與失範〉("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這篇論文是美國大學中社會學這個「正常科學」的範典了。Benjamin Nelson, "Review Essa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by Robert Merton." In *Varieties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209.